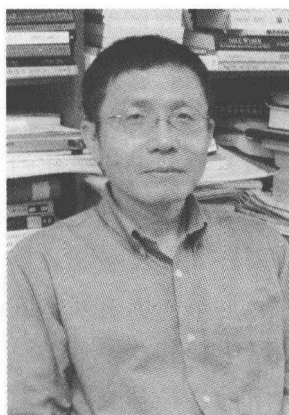


名家访谈

迈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之路

——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黄瑞祺

张艳涛*



黄瑞祺，男，1954年生，台北市人，1977年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学位，1980年获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暨政治学系博士学位。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欧美社会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生态和全球化问题研究。兼任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客座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其代表性著作有：《批判社会学——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现代与后现代》、《马学与现代性》、《绿色马克思主义》（合著）、《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迈向后实证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集》、《绿色马克思主义的形塑轨迹》（合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

▲（采访者简称▲，下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兴起一股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热潮，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总的来说，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体有三条路径：其一是“回到”马克思原创文本的研究，这是一条以“返本”求“开新”的思路；其二是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对话，这是一条“取长补短”的思路；其三是在当代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这是一条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良性互动、双向矫正”的思路。这三条路径从不同侧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勾画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图景。请问黄先生，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属于哪一种？您是如何从社会理论研究走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之路的？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欢迎您到“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来研究，也很高兴在此接受您的访谈。您说的三条途径在当代都是必要的，我或多或少都曾涉及过。首先，我曾经选编过三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集：《马克思论方法》、《马克思论现代性》、《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说选集》（合编），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写作。其次，我本科专业是社会学，最初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接触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系有一门课是“社会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主要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之一。后来直接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以

* 张艳涛，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访问学者。

及西方相关的社会科学、哲学文献，留意于其间的交流、对话和比较。例如社会学家顾德诺（Alvin Gouldner）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援引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当时的“社会学主流”（尤其是美国社会学者帕森斯的学说），号称为“激进社会学”。顾德诺也出版《两个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

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固然能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保守的）社会理论进行犀利的批判。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借鉴社会科学的政策运用（所谓的“政策科学”或“规范理论”）以及精巧的方法（如统计、抽样、量化、质化等等方法）。这就是您所说的“取长补短”的一个例子。

您说的第三条途径是在当代理论与实践的交汇点上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界，这一点我认为不可或缺。也许我的体会和您的提问不完全相同。我认为，要研究一个理论，去研究它的实践，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落差是一条快捷方式。实践上的问题或偏差，有的可能是“人谋不臧”或执行不当，然而不可否认有的是根源于理论本身的问题，换言之，这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理论的真假优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问题有些可以追溯到理论层面的问题，可以加深对于理论的理解，也提供对理论进行反思及批判的助力。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也应包含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地的实践经验。不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即使一般民众也会根据一种思想理论（尤其是一种主义）的实践结果来评判该思想，这是思想理论无可避免的命运。因此，与其消极回避，不如真诚面对、真诚反思。当然有些账也不该算在“主义”头上，总而言之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黄先生，您是从社会理论研究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对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启发性。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不完全是一种实证科学和经验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综合经验理论和解释理论。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渗透、转化，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思潮和理论增长点。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我很赞同您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问题是什么样的“科学”。在实证主义霸权瓦解后（所谓“后实证主义”），科学观日益多元化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它并不隐瞒它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一种命题系统，从中推导出具体的预测命题，然后看是否符合事实，间接验证理论的真假。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科学或理论，它综合了价值观、事实及趋势分析、资产阶级当事人的言行和意识形态等等。它的定律只是一种趋势，能否实现还得看具体条件是否具备。这些元素构成了它的批判，所以批判科学若要有效地批判，必须包含相关的经验分析、定律、解释、意识形态分析等等。

人有自反性（reflectivity），即人会吸收社会知识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换言之，社会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社会政治理论应因势利导，利用此自反性促进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由此可见社会批判理论之意义了。社会批判理论系根据自反性而设计出来的科学逻辑，因势利导，试图主导社会发展。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显然和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认知兴趣不同。我曾著有《批判社会学》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

▲：中国大陆近年正在着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成立很多“马克思主义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这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从价

值取向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不可能像一般“研究机构”那样,仅仅满足于“学术性”研究,也不可能像一般“思想库”那样,仅仅进行“对策性”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走在“学术”与“思想库”之间,一方面要对现时代做出学术性应答同时又不能完全“象牙塔”化,另一方面要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决策建议同时又不能完全“意识形态”化。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可以走向更常规化或规范化,能够引进全球通行的学术规范。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提升有所帮助,对于学术交流也有所帮助,因为有学科的支持。所以长远来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肯定会有帮助。

科学可以区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应用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也称为“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一种基础科学或学科(基本原理),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也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在各种制度建立(institution-building)和政策制定的政策科学,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外交战略、生态政策、政改策略等等。所以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基本原理或基础研究的学科或科学,也应该包括政策科学或应用研究。如果马克思主义学院包括基本原理以及政策科学的话,它就可以兼有“研究机构”和“思想库”的性质了。“思想库”在台湾称为“智库”,主要包括一些“政策科学”或“政策研究”。“政策科学”或“应用科学”也是一种科学或学术,虽然它们包含着一些政策目标或价值在内。马克思主义学院可以引进“政策科学”,接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介入或参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您是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请您谈一下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当前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面临哪些困境?

●:先从历史上来看,台湾在日治时代由右翼军阀掌权,基本上是禁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也是禁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过随国民党来台的有几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例如叶青著有《马克思主义批判》(1974年)、《毛泽东思想批判》(1974年),郑学稼著有《列宁评传》(1960年)、《青年马克思》(1992年)、《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争论》(1976年)、《马克思体系的完结》(1975年)等书,胡秋原著有《唯物史观艺术论》(1990年)、《由俄罗斯之虚无主义到共产主义》(1952年)等书,他们可以称为台湾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多是1949年来台者,大多持反共的立场。因为,当时特殊身份者才能通过特殊管道获得资料研究马克思主义,通常是和所谓“匪情”或“大陆研究”结合,否则会被怀疑、打压。这个情况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才改变。姜新立著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贫困》(1980年)、《分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典范的反思》(1997年)等书,洪镰德著有《马克思》(1997年)、《西方马克思主义》(2004年)等书,陈璋津等从年龄上可以算是第二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三位基本上已从岗位上退休了。之后就是第三代(中生代)的研究者了:黄瑞祺、李英明、孙善豪、陈宜中、黄之栋等,这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正在凋零当中。目前在台湾没有政治打压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没市场,这个情况从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就这样了。从1987年台湾“解严”到1989年,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热门过短暂时间。1989年之后就降温了,听众和研究者都急速流失。一段时间以来,我大概只有赴大陆高校交流时才有机会谈马克思主义了。出版方面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书难出也难卖。

▲:近年来,在大陆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确立为国家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全国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迎来了“春天”。自2004年中共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到2005年年底,“马克思主义

理论”设立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6个二级学科，这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但也存在如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理解和研究的问题。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被有些人有意地“曲解”、无意地“误解”、人为地“肢解”了，这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形象。因此，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形象，从“整体上”完整理解和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共同的课题。请问黄先生，如何从整体性的视角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现代学术研究过程中，界定、分析、综合等研究程序以及对研究成果的论证都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和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应该引进现代学术规范。这意味着任何结论都应该是通过界定、分析、综合、论证等程序而获得的，否则就是教条或先验的预设，而不是现代学术或现代性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应该是经过研究的结论，换言之，这个整体性应该是经过分析、论证之后的整体性。您上述提到许多的整体性和“统一”涉及大量的研究工作和资料，我无法在此做简单回答。我主要提出现代学术的“程序理性”规范，个别结论必须以此为标准来判断，无法一概而论。

其实，整体性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比您提到的问题更广。例如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和晚年的著作之间，阿尔都塞主张有认识论上的断裂，也提出了许多论据。我们如果不赞同阿尔都塞，可以提出论据来反驳，第三者可以根据双方的论据来决定赞同或支持谁。这就是现代学术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从1843年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83年去世，整整有40年的写作时间，而且有那么大量的著作，其间若有不一致、差异、脱节、不连续、分期，或者有不同的强调或趋势例如结构或行动、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等等亦属正常。比较而言，西方学界比较擅长分析，一段时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流行分析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缝隙”，有时难免稍嫌“走火入魔”，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被片段化了（fragmented），例如顾德诺有一本书——《两个马克思主义》。不过有时他们也抓到了一些问题。例如上述阿尔都塞的论调、另外威尔马（A. Wellmer）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潜在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不过这一类研究也不一定都得到负面的结论，例如柯亨就认为应该把分析哲学的清晰、严格的标准运用在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上。他宣称：“我坚决支持那些标准，不过我也比那些自认为能够运用那些标准的人更为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扬弃马克思理论，经常不是因为他们运用该标准太过严格，而是不够严格所致。”这种研究趋势也是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的一个来源。

禅宗有一段颇有辩证法意味的话：“老僧30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现在又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了。”未经分析、抽象的整体性是第一种境界；而原始浑朴的山水，经过抽象分析的山水，原始浑朴被破坏了，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原始的山水了，是第二种境界；最后迈向综合重建的山水了，是第三种境界。我们无法阻止研究者去分析抽象，也不必假定他们是有恶意和阴谋的，其实他们大多数只是想找个好的题目写论文或书而已。马克思主义在经过各家抽象分析之后，若能迈向综合重建，形成完整的图像，则更能披沙拣金，也才经得起检验。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应慎防整体化会阻碍创新，解释学和科学一样，不断追求新的解释、更好的解释。因为没有“最好的”解释，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新的证据及新的解释。极端的整体化容易导致僵化的解释，未来永远可能有新元素和新解释出现。

▲：当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交流日频、交融日深、交锋日烈。通过您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您视野宽广，广泛涉猎西方社会学理论，并且总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相互借鉴、

相得益彰。这样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您鲜明的学术形象和综合性的知识论分析架构。那么，您为什么长期致力于研究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等问题研究，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怎样的？

●：在我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无法一刀切，时至今日二者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互相转化、良性互动了。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非马流派中汲取养分，发展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流派，例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博弈论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种种流派也反哺于非马克思主义。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结构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给非马克思主义很大启发，而法兰克福学派又是汲取弗洛伊德心理学、尼采思想等而形成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也糅合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而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如在这些例子中所显示的糅合在一起了，在我的思想中二者也是如此。我常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非马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非马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山还他一个山，是水还他一个水”。

我曾经在台湾出版过一本《马学与现代性》，主要谈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从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的红火议题现代性看马克思主义，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看现代性，都有别开生面的理解。马克思是启蒙之子、现代性之子，他的著作很多是分析现代性、全球化的，例如《共产党宣言》探讨资产阶级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及发展，《资本论》探讨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资本主义的原理、病态、展望等等。现代性也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旨趣及贡献。现代性确实是一个近代的总问题框架（problematic）。许多近代思想家都是针对此问题来提供解答或解决方案、建构他们的理论，例如歌德、黑格尔、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桑巴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等（这份名单恐怕是挂一漏万），马克思自然也不例外。

▲：现代学术研究应具有方法论自觉意识。通常，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的选择，而研究方法选择又会影响研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请您谈一谈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注意哪些方法问题？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综合经验理论和解释理论？

●：我有一篇探讨马克思的方法论的长文，曾刊登于《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在这里只能勾玄提要。首先，马克思的方法论联系着他的科学观、认识论以及本体论。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这句话一方面表示马克思有他自己的科学观和本体论，有待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诚如您说的，方法论和研究对象绝非互相独立的、而应该是配套的。有人可能因为这句源出《资本论》第三卷的话好像与本质论有关而讳言，其实这句话以结构主义或以批判实在论来理解更合适，也更为现代。其次，我对马克思方法论的探讨是放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脉络中，从二者的交流、借鉴来理解及阐发。

马克思主义就总体而言是一种社会批判科学及理论，而不是一种实证科学及经验理论，因为按照实证科学及经验理论的逻辑，理论的主要判断标准是从理论演绎出来的具体的假设（在事件发生之前就是预测，在事件发生之后就是说明）是否正确。这里面包含两条规则：假设要是具体的，理论的判断标准由假设来验证。按此规则马克思主义并不符合，或已经被否认了（别的不说，简言之，资本主义至今仍屹立不摇就是一个证据）。所以马克思主义即使欲成为一种实证科学及经验理论而不可得。马克思也常提“批判”，虽然他并没有说明过批判的理论逻辑和结构。批判不仅是以道德意义而言，虽然这也是其中之一义（例如批判剥削及异化等包含了道德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批判的知识论或方法论的意义。从批判的理论结构而言，除了道德批判之外，还包含有经验理论（因果分析、定律）和解释理论（当事人的言行或意识），这些都是批判理论的要素，但是还是以批

判为主。经验理论与解释理论互相对照，将显示哪些解释是意识形态，哪些符合客观事实及关系。这也是批判之一义，也能显示哪些事实及关系只是一时一地的权力及意识形态所冻结起来的，哪些事实及关系是真正客观的规律性。这也是批判之另一义，所以千万别以为批判只是道德批判而已，这是严重误解“批判”的意义，例如康德的第一批判和黑格尔的批判都不是道德意义的批判，跟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多少有些关联。和批判相关的议题我在《批判社会学》一书中有比较充分的阐述。

▲：您的著作在大陆影响较大，我最早研读您的《马学与现代性》是2004年在中共中央党校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就有一种“惊奇”之感，台湾地区还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感兴趣和精专的？！这本书对于我理解马克思和现代性帮助甚大。据我所知，您的很多著作在大陆学者中影响很大，不少学者的硕士、博士论文和著作都曾引用过您的论著。您有什么感觉？

●：我的著作能在中国大陆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我始料未及的，尤其是以繁体字的形式，因为那原来是在台湾出版、写给台湾读者看的。据我所知，我的早期著作例如《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都曾以台湾版的形式在大陆被传阅、参考。这让我对于文字在时空中的延展性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及触动。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作品是《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是我的一本选集，书中本来有一部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篇论文，却被出版社给拿掉了，我为此郁闷了好久，想到身为在台湾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光在台湾被边缘化，在大陆也备受打压（至少在那时）。不过，随着2009年在《鄱阳湖学刊》连载与黄之栋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生态轨迹》，以及2011年到武汉大学办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讲座，终于释怀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对学界的一些主流思潮，包括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等的反思和批判，试图找寻其他的出路。这些努力可以概括在“后实证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旗帜下。您最近推出的《迈向后实证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集》一书，既是您用思想传递时代精神的学术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也是您对多年方法论学术成果的清理与总结、提升与升华。您是如何迈向“后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后经验主义”和“后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西方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实证主义当道，实证主义及新实证主义的各个面向，诸如经验主义、行为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大行其道，试图按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人文社会现象，形塑社会科学。20世纪60年代后，学术界开始有些悸动了，强调批判和实践的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的相关著作问世了，开始抗衡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美反思和批判实证主义的学者例如：米尔斯、顾德诺、吉登斯、伯恩斯坦等影响力渐增，欧陆或德法反实证主义的学者或流派就更多了，如晚期维特根斯坦、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至此，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瓦解了，“道术为天下裂”，反思、批判实证主义的流派有如雨后春笋。我在台湾大学念硕士生时就开始浸淫在这股思潮中，我在当时编译的《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最后一章《功能论与实证论》开始对实证主义进行反思及批判。到英国留学也跟随批判实证主义不遗余力的吉登斯学习。

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对于这股反实证主义思潮有启发之功，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强调批判及实践，这种精神部分是通过当代流行的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等思想展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其实也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的学生威尔马在他那本《批判理论》中曾说马克思恩格斯有潜在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倾向，这和后来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可能有关。这也难怪，在实证主义当阳称尊

的时代，少有人不受影响，甚至连康德也不例外，牟宗三就经常说康德是一个大实证主义者。我猜牟宗三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康德以牛顿力学当作知识（包括人文社会知识）的典范。在迈向后实证主义的路子上，我们都该反思、批判实证主义残余，让人文社会科学能自发地找寻他们合适的、正确的路子去发展。而不再受“科学要挟”（要成为科学就要“如何如何”）硬穿上（某种诠释的）自然科学的“小鞋”或“紧身夹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要反思马克思恩格斯潜在的实证主义元素或倾向，以分离出他们的非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及方法论。

▲：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人民大众所拥护。因此，那种不关照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不关心大众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理论，是对“理论”与“大众”的双重误解。就此而论，中国大陆部分学者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纯粹学术化和学院化、纯粹意识形态化、纯粹“马克思学”研究，都是值得商榷的。您的许多理论观点在大陆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与产生较大影响，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您的学术研究触动了时代的真正问题所致。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能否简要概括一下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

●：今天马克思主义应成为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以及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常规化、规范化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施政和公共政策应该以民众福利、国家利益为基准，因时因地制宜，没有现成的意识形态或规则可以遵循。我在2007年8月到德国斯塔恩贝格访问哈贝马斯时，曾问他：马克思主义和今天是否还相干？他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是重要的，不过每个地方都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他的意思简言之就是要避免教条主义。在此学术化与非学术化、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区别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学术研究也要寻找重要的、有趣的问题来研究，研究过程要“实事求是”才是关键所在。学术或学科只是比较精致化的认识方法和过程，一般人也有他们的认识方法及过程。

▲：半个世纪前，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曾指出：“要对卡尔·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点什么，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当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困难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困难，更是颇具学术性的工作。”您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对很多人来说，学术研究是孤独和寂寞的，而您却乐此不疲，乐在其中。您的学术研究与您的生活世界是什么关系？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我研究社会政治哲学，有机会当然希望能“改变世界”，如果没机会也只好“卷而怀之”，与少数友人、学生论学，其乐融融。社会政治哲学与现实社会政治之间有反思性（自反性）的关系，社会政治哲学会进入生活世界，从而改变生活世界，不管我们愿意与否。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亚当·斯密、凯恩斯等的学说通过进入生活世界，已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生活世界。

诚如您所说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孤寂的，也需要相当程度的孤寂来提炼和深思熟虑，或者如哲学家殷海光所说的知识人需要一种“隔离的智慧”。学术合作可以稍微调和这种孤寂，“自古文人相轻”，在文科学术合作不容易，学术合作追求 $1+1>2$ ，换言之，大于个人的总和。合作者若有互补的能力和专长，加上有足够的意愿和默契，就可能创造成功的合作。这虽然不容易达到却值得追求。我与黄之栋之间的合作就有颇为丰硕的经验。再者，有机会与三五好友、学生相与论学也就能稍慰平生了。

▲：当前，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科学判定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正在由“生存性需求”走向“发展性需求”的进程中，基于“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基本原理和当代文化视野，深入研究人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等中观和微观问题。比较而言，西方学术思想较为重视用微观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社会心理

问题，已取得不少积极的研究成果，具有启发意义。

您认为，应该如何夯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微观基础”？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层理论”？马克思主义应如何研究“社会心理”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大的历史社会发展框架。诚如您所说的，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以及“意识形态”都涉及社会心理，不过都是在“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下，着重于社会存在对于意识或心理的形塑或决定，对于心理的自主作用比较忽略。人生在世有几种不可或缺的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天。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与人的关系最为重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多所着墨，然而对于人与自我的关系（心理学）以及人与天的关系（宗教）却相当忽略。无可讳言，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层理论”和“微观基础”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阿多诺曾探讨过“权威性格”，艾尔斯特则主张“理性选择”、“博弈理论”可提供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社会心理学中的参考团体、相对剥夺、情境定义、标签作用、自我实现的预言等等社会心理作用都应用很广泛，可以提供马克思主义参考。今天在大陆，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以及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有条件大开大阖、取精用宏，也要有这种自信。

▲：现代性是一个发轫于西方而席卷全球的进程，这一进程与资本主义内在相关。在西方视阈下，现代性往往被理解为一个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现代性表现为理性或合理性对经济行为、政治行为以及文化行为的渗透。然而韦伯语境下的现代性解释模式却未必完全适合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独特道路？中国如何能够在充分占有现代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现代文明一种新的可能性？如何看待中西方现代性不同的价值排序？

●：现代性是一个多维多面的现象，以工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为核心，从某种视角而言，说它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并没错，因为它把生产等过程加以理性组织。从世界史的视角来看，现代性是一个发轫于西方而席卷全球的进程，现代性在西方和非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和性质，非西方社会大多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这个原来发轫于欧洲的漩涡，例如中国、日本、印度等都是被船坚炮利敲开国门的。中国现代性在此契机之下，想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大体从器物层次如船炮钟表等，到制度层次，再到思想层次。其中，过程坎坷、争议不断，西化派（全盘西化派只是其中一派）、传统派争论不休。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一直还没充分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化和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应该是“赛先生”的进一步落实和体现。“德先生”可能比较有争议，也是政改应该考虑的。

除了上述从历史进程来看之外，中国现代性也是一个共时性的世界体系的问题。当前的世界体系基本上是一个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由欧美国家主导。在这种体系约束下，发展很可能沦为依附性的或被宰制的发展。为了避免这种发展，有时某种程度的自主性或自力更生也是必要的，即使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对于中国发展而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当前，中国发展的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增强，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那么，如何运用“关系思维”和“系统思维”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资本主义仍是当代环境问题的关键，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逻辑导致一系列危机。

反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态观的理论贡献在于，它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又超越自然中心主义，

它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系统性，因此，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请问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批判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战略制高点？

●：我认为，GDP绝不是衡量发展或增长的唯一尺度。牺牲生态环境以取得经济发展将是得不偿失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想要恢复极为困难。而且破坏生态环境也很难跻身于世界文明大国之列。再者，目前大陆环境问题由于群体性事件频传而影响了社会稳定。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邻避设施”——不受欢迎的设施，例如污染性的工厂、垃圾场、核电厂等等，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大陆近年由此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较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产生冲突时，势必有所妥协，简言之，就是牺牲一些经济发展，以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学原是研究有机体（包括人）之间以及有机体与其物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物学分支，所以包含一种“关系思维”。生态学重视“生物/环境”所组成的整体，不应破坏人与环境的和谐伙伴关系。2007年2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谓：造成全球气候暖化的主因有九成的可能性是来自人类的作为，因此人类是造成这波全球环境变迁的元凶。吉登斯在他的探讨气候变迁的新著《环境变迁的政治》中也说：科学界已达成高度共识，认定气候变迁是真实且危险的，而且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相对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对自然所做的事，自然会报复于人类的，例如滥伐森林造成泥石流。由此可见，人和生态环境是会互相影响的。自然辩证法确实是存在的。

我与黄之栋教授合著有两本有关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专书《绿色马克思主义》、《绿色马克思主义的形塑轨迹》，对于相关的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对于当前生态学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达到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人不只是利用自然、剥削自然的主体，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会受到自然报复的客体。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包含了三个系统（同心圆），最大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其次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核心的还是资本主义批判，可说是系统井然。三是，在生态危机中制度（资本主义）仍然是关键所在。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导致生态危机。更为严峻的是，由于资本主义日益全球化了，生态问题也随着帝国主义化、全球化了，所以生态的探讨及改善不但必须着眼于资本主义逻辑的批判，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同时也必须与时俱进，采取全球观点。这也意味着今天中国内地也不能一头栽进发展主义的泥淖，资本主义虽然不断演化，还是有它的基本的问题，必须维持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这就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了。

▲：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今后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主题及计划是什么？

●：我还是我，研究大体上还是延续的。在既有的几个方向上继续做下去，诸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生态学、马克思与现代性、全球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哈贝马斯、批判实在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福柯晚期研究、福柯的伦理学、修养论、社会政治哲学以及其间的关联。

▲：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学术之树常青！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在此与大陆学者交流，期待两岸文化交流能不断扩大加深，感谢您在这方面的积极努力。

（编辑：汪世锦）